

章太炎剖析

一 问题的复杂性

- (一) 历史地位
- (二) 思想源流
- (三) 四个时期

二 社会政治思想的特色

- (一) 是“地主阶级反满派代表”吗？
- (二) 反资本主义的思想
- (三) 阶级特征

三 “依自不依他”的哲学思想

一 问题的复杂性

(一) 历史地位

中国近代是大动荡的历史时期。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时代激流中,一些本来站在前列的代表人物,很快就退到后列,甚至成为障碍,由人们所景仰所追随,变而为所舍弃所批判的对象。康有

为、严复如此，章太炎也这样。中国近代各个阶级、阶层、政治派别有各种复杂的变动，它们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变化就更为错综复杂。可笑的是“四人帮”，为了搞政治阴谋，竟想用一个“儒法斗争”的简单公式套在这些复杂问题上，把严复、章太炎统统说成是什么“法家”。无稽之谈，甚嚣尘上。如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正确分析和评价章太炎，竟成了一个突出问题。

人所共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旗手和领袖是孙中山，而非章太炎。虽然总的说来，章太炎不失为当时革命派中的杰出人物，但他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和具体作用，是很不相同的。有的时期，章太炎起了很好的影响；有的时候，起了很坏的作用。这既不是一顶荒唐的“法家”礼帽所能抬上去，也不是一张收集“劣迹”式的公告解释得了。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一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从推动或阻碍历史发展的大小着眼，确定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而不是单纯从个人着眼，沉溺在个人的各种思想、行为的细节中纠缠不清。首要的是在历史上的客观功过，而不是个人某些主观言行。所以，这既不是去平衡个人的一生言行，也不是去抽象品评个人的道德、品质，应该以历史学而不是以伦理学的标准来作为衡量尺度，除非这种道德、品质确在当时或后代造成了重要客观影响^①，更不是带着主观框框片面去集中优点或缺点。人不是神，总有各种长处和弱点、功绩和错误。把屠夫的伪善张扬起来，可以被当作圣人；把英雄的缺点抽象集中起来，也可以认作是坏蛋。何况是并非屠夫或英雄的章太炎，何况是处在迅速的历史变动时期的章太炎。这里需要的是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问历史时期，不作具体分析，笼而统之，混为一谈，是很难确定章太炎这样一位处

^① 参阅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九章黑格尔论历史高于道德。

在复杂时期中复杂人物的本来面目的。

章太炎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他在当时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很明显是担任了一个思想家、宣传家的角色。他始终不像孙中山、黄兴、陶成章、宋教仁以及袁世凯、黎元洪、张謇……等人那样,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组织活动中起过多大的领导作用或实际作用。他主要是凭一枝笔进行斗争,在思想领域内起了重要作用^①。

具体一点说,章太炎的一生约可分为四大段,即一八九四年——一九〇〇年;一九〇〇年——一九〇八年;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章太炎虽自称少年时即有反满民族思想^②,但在一九〇〇年以前,与当时大多数先进中国人一样(只有孙中山这时打出了革命旗号),他在政治活动和提出的政治主张上,基本是追随和从属于康、梁改良派范围内的^③。其哲学思想也与改良派同样,具有由于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影响而显示的机械唯物论色彩。这可算作章的第一时期。从一九〇〇年“解辫发”到一九〇八年《民报》停刊,是章的第二时期。尽管思想中佛学唯心主义日占上风,发表了大量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总的说来,章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是与改良派进行了尖锐的政治

① 这种作用不是几封未公开发表,在历史上也并无影响的私人书信能替代或等同的。唐振常《论章太炎》一文(《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就有此缺点。

② “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与陶亚武柳亚卢书》),“架阁有蒋良骥《东华录》,尝窃窥之。见戴名世、吕留良、曾静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贱夷狄之旨。”(《自编年谱·一八八〇年》)

③ 只是“基本”,“知是而逐满之论,殆可以息矣”(《馥书·客帝》),章与改良派在反满、民权、今文经学等等方面,一开始便有歧异。著名的《客帝》便存在既帝清又客之的矛盾,而帝孔则又是改良派的影响。又如:“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自编年谱·一八九七年》)。

思想斗争。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到《民报》上的许多文章^①，所起的影响是巨大的，功绩是显赫的，虽短暂不到十年，却是章的“黄金时代”。从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三年，则是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大闹分裂，反对孙、黄（兴），拥护黎（元洪）、袁，起了很坏作用的时期^②。这个时期他的政治活动很多，大都不利于革命。一九一四年被袁世凯软禁到晚年，则是实际日益离开政治、思想舞台，成为虽声名颇大门徒众多，但已和时代脱节的“国学大师”的时期。当然在这最后的漫长的二十多年中，章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又有一些变化。但不管是变好（如反对北洋军阀，南下与孙中山合作，晚年主张抗日等等），还是变坏（如二十年代后提倡读经，反对白话文运动等等），在社会上实际已没有什么重要的客观影响，不起多少作用，远不像早年了。他与人民与广大青年早已隔膜，成为仅具历史意义的过时人物。很明显，章太炎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家、宣传家，确定他的这种历史地位和意义的，主要是第二时期。是这个时期的笔墨文章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否则人们早就把他遗忘，也根本不会成为今天争议的问题了。

（二）思想源流

历史或人物分期很难一刀齐，思想更是如此。后（前）一时期可具有前（后）一时期的某些思想，进步（落后）时期，也可保有某些落后（进步）思想。一部《馥书》，章太炎就先后改了多次。由梁启超署签的一九〇〇年的苏州木刻本（可代表第一时期），不同于邹

① 《驳康书》与《民报》时期，思想又有不合，可以一九〇六年为界分为两小段。前段多同于当时革命派一般主张，后者更具个人特色。详后。

② 例如章大肆公开辱骂孙中山，一九一〇年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公开分裂出去，章被举为会长。辛亥举义后，革命派绝大多数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只有章太炎反对，极力推举黎元洪，对袁世凯百依百顺，等等。

容题端的一九〇四年的日本铅印本(代表第二时期前段),也不同于一九一四年大量增删、改定并更名的《检论》本(可代表三四两时期),每次都有很大的增删修改^①。其他文章也有类似情况。一九一四年《章氏丛书》里没有收入他在《民报》时期痛斥吴稚晖的著名信件,也没收入与蓝公武论战的信件,这些信件却正是被鲁迅赞为“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攻战的文章”的。既然主要是把章太炎作为思想家来看待,那末就应该仔细对照和研究这许许多多的思想变化和文章的修改,才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这是一件繁巨的工作,非本文所能及。这里只先描画一个初步的轮廓。

多年以来,人们常喜引用马克思关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借用古代亡灵和语言来进行斗争的著名论断。其实,马克思接着还说:“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言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当他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〇三——六〇四页)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当然不只是语言,而且是比喻革命。欧洲资产阶级当它达到比较成熟境地的时候,才抛掉古旧衣装和语言,“洛克就排挤了哈巴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〇五页)。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其革命的英雄时期,也是总要把刚学会的欧洲资产阶级的新语言,在心里翻译成中国传统的旧语言。如何把外国新语言(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译成本国语言(即古典传统文化),是当时满肚子封建文化的知识分子所心向往之而不能摆脱的病症。章太炎当年所以大受欢迎,在革命派中赢得如此受人尊重的地位,除了坐牢等革命气概外,与这一点也大有关系。章太炎适逢其会,他娴熟之极的旧语言,使人们感到只有他

① 此外,还有一九〇二年的手校本,一九一〇年的手改本(均未刊)。

才是康有为(也是用旧语言译新文字,即用“公羊三世”、“托古改制”来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旗鼓相当、真正够格的敌手。章太炎成了这一代没有“功名”^①却有学问、能与上一代饱读诗书享有功名爵禄的士大夫相颉颃的代表。

康有为抬出今文经学搞变法维新,章太炎用古文经学宣讲种族革命。二千年前汉代王朝中炽热的封建文化的经今古文之争,居然在晚清死灰复燃,回光返照,正是这种特定时代要求下出现的奇观。无论是今文经学派的皮锡瑞、廖季平或是古文经学派的俞曲园、孙诒让,所以都远不及康、章的影响^②,原因就在后者突出体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

晚清经学今古文的是非和它们与当时政治斗争的联系不属本文范围。这里要指出的只是,尊奉古文经学与章太炎思想、文章面貌的复杂有关。因为古文经学更着重于历史的详细考核与论证,章太炎由此而对祖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字、法律、风习……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论列,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成了章太炎旁征博引出入自如的依据。从文字声韵到历朝史实,从典章制度到人物品评,章太炎在其文章中所涉及所论述过的对象、问题、议题、主张异常广阔;比虽诡异但较狭窄,奇谈怪论虽多但目标、含义却较单纯的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要远为宽绰和复杂。如果用《诂书》来比当时的各种政论和著作,这一点就很突出。《诂书》每个议题大都联系历史,引古证今,它比《盛世危言》、《变法通议》之类就事论事的时论,具有更多的理论学术色彩。然而也就在这种诘屈聱牙的古文

① 章一生未参加清廷科举考试,十七岁(一八八四年)即“废制义不为”(《自编年谱》)。《苏报》案受审时,大加嘲笑审者问他是哪科士人。

② 甚至在纯粹学术领域里也如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说比廖季平在学术成绩上也更突出;章太炎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许多见解,则是继章学诚“六经皆史”著名学说后的最有成就者。

词中,又居然包含着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的知识介绍和解说,它比《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之类有更明白的政治内容。它是一种半政治半学术的广阔评述。从而,其复杂性更突出了。

构成章太炎思想的复杂性的另一原因,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吸取继承,也比别人远为庞杂。他不像康有为明确以公羊、陆王为思想主干,一开始就形成较完整和固定的体系;也不像严复明确以英国经验论和进化论为基本思想;也不像孙中山明确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主体。章太炎最初“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归宿则在孙卿韩非”(《章太炎自编年谱》)。后来又以佛学唯识宗为主,企图将道、儒、法和西方哲学等等熔为一炉。而他对所有这几个方面的探索,比别人都要深广。例如,西方哲学他本不如严复懂,但他所论列评议的对象却比严复要多得多^①。他的博杂有类于梁启超,但比梁远为深入,梁浅、杂而多变,章则相对稳定;章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梁则始终没有。章太炎曾自述说:

……思想变迁之迹,约略可言:少时治经,谨守朴学……
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谓不可易。自余闾渺之旨,未暇深察。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

① “在中国哲学史上,章氏则上自老庄孔墨荀韩诸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明清各家,下抵公羊变法的康有为谭嗣同以及严几道等均有评判。关于西洋哲学,在古代则谈及希腊的埃里亚学派、斯多葛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等,在近代则举凡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培根、休谟、巴克来、莱布尼兹、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笛卡尔以及斯宾诺沙等人的著作几乎无不称引。关于印度哲学则吠檀多、波罗门、胜论、数论各宗、法华、华严、涅槃、瑜伽诸经,均随文引入。对世亲、无著之书,尤为赞佩。”(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卷第八六一页)这一描述是符合事实的。章太炎还翻译过社会学著作。

涅槃诸经，义解渐深……，专修慈氏世亲……乃达大乘深趣。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以为仲尼之功贤于尧舜，其玄远终不敢望老庄矣。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稽论语，……又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知其阶位卓绝，诚非功济生民而已……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蕲汉微言》）

在如此庞杂繁多的议论和思想变化过程中，当然会有极多的先后出人和自相矛盾。一生针对那么多的问题，发了那么多的议论，又接受吸取那么多的学派思想的影响，如果其思想、主张、言论、行为以及政治态度等等没有矛盾变化，倒是非常奇怪的事了。在改了多次的《馗书》中，这种自相矛盾冲突之处就有不少^①。一本书如此，更无论一生了。不注意或抹杀这种思想的复杂性，不问历史时期和具体情况，片面集中某些材料，是既可以说他“尊法”，也可以说他“尊孔”，既可说他“反孙”，也可说他“拥孙”^②，还可以说他如何如何的。列宁说得好，“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③“四人帮”的法家说，正是这

① 例如，《馗书》初版本刻本中的古今文的矛盾、改良与反满的矛盾等等，再版铅印本中的专制与共和、国粹与西学、反宗教与主宗教的矛盾等等，对各种人物、事件、问题的矛盾评议，更是所在多有。

② 章是最早支持孙中山的人。一九〇二年与孙“定交”，“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民报六期·演说录》），《馗书》铅印本中颇称引孙。

③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七九页。

种“连儿戏也不如”的货色,只有全面地如实地考察章的思想,在这种矛盾错综的复杂性中抓住主要的环节和线索,才能还它以本来面目。

三、四个时期

从上述四个时期大体说来,第一时期,章太炎哲学上基本是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影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归宿则在荀卿韩非”,但这丝毫不意味章太炎是法家,因为章主要是从古文经学立场出发,认为荀所传是春秋左传学(古文经),是孔门真传、儒家正统,韩非也多引左传立论^①。在这一时期,章并不反孔非儒,而是仲尼荀卿并提,满口仲尼不绝,如《馥书·独圣》等篇。同时也并不尊法,例如,他说诸葛亮是法家,最后却评论说“亦其所以为小器焉尔”(《馥书·正葛三十六》)。他说“李斯……涤荡周旧……其僭新也,裊以害新也”(《馥书·尊荀第一》)，“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硬要把这篇尊荀说成是尊法。因此文有“虽骤变可也”的字样,便说章太炎主张“骤变”。其实原意恰好相反,是强调革新必须重视遗产的因袭继承,李斯全部涤除“周旧”,反而是“害新”。《馥书》首篇《尊荀第一》还有“素王”之类的提法,第二时期即被删去。第二时期的前段,是与改良派划清界限,接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改订的《馥书》,为邹容序《革命军》、《驳康书》是代表,后段则是章的思想体系基本定型的成熟阶段,这个阶段以狱中深入钻研佛学唯识宗为根本基础,出狱后又进

① “时余所操儒术,以孙卿为宗”(《自编年谱·一八九七年》)，“故荀子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馥书·尊荀第一》)。“儒家之荀卿,又为左氏、谷梁、毛诗之祖”(《诸子学略说》)“韩非引左氏说最多,其辩论变由而不杀”。(《与刘申叔书》,此二件均写于一九〇六年,但思想早有。)

一步广泛涉猎西方和印度各家学说,力图综合融会所有这些,构造了一整套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体系。如果说,《馥书》尽管有自然科学唯物论思想和启蒙主义,但独立性格尚不明显,思想体系尚未成熟;那末,这一时期就成熟了。然而这个成熟期哲学体系却是以佛学唯识论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这时,孔丘和儒家的地位特别是哲学地位在章心目中大大下降。《演说录》和《诸子学略说》都曾痛斥孔丘和儒学。应该承认,它与当时革命派中要求冲破封建传统和孔丘偶像的束缚(例如《民报》创刊号刊载墨子画像称为“世界平等博爱主义第一大家”而置孔丘于不顾)的思潮一样,是难能可贵的。但章太炎即使在这时也并未完全否定孔丘,并且还说“虽然孔氏之功则有矣,变讥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复绝千古”(《诸子学略说》),^①可见根本不像“四人帮”所杜撰的那样。第三时期,实际是过渡,可以《齐物论释》(1910年)为标志,庄周这时被抬为最高的哲学,以佛解庄,溶庄佛于一体。到第四时期,则是“以庄证孔”,孔庄合一。本来是许给庄周的“内圣外王”的地位^②,现在又仍然还给了孔丘。章自称“始玩爻象”,“渐知易矣”(《自编年谱·一九一四年》),都是说回

① 这篇文章讲到法家韩非时,认为韩是“合此二事(指道家和儒家荀卿)以成一家之说”,又说“至汉公孙弘董仲舒辈……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仲舒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应廷尉张汤之问,儒家法家,于此稍合,自是以后,则法家专与纵横家为敌……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如是云云。可见“四人帮”捧出章太炎来讲儒法斗争,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罢了。《讨满洲檄》(一九〇七年)也强调“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繫先圣是赖,是乃其高于尧舜文武而无算者也”,孔丘的大学问家、大教育家的地位,从早年到晚岁,章从未动摇改变过,即使在“批孔”中亦如此。

② “释迦应之,故出世之法多详于内圣,……孔老应之则世间之法多而详于外王,兼是二者,厥为庄生。齐物一篇,内以疏观万物……外以治国保民”(《荜汉微言》)。《荜汉微言》是第四时期的语录,其中有好些第三以至第二时期的思想残存。

到孔学回到周易的怀抱。孔学这时不仅能与佛学平起平坐,甚至还在佛学之上,“必以大鉴、马祖过于孔子,是亦妄而已矣”(《荊汉昌言》)。对于以前鄙视的“程朱以下尤不足论”,现在也都予以肯定,“亦各达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荊汉微言》),并对过去反孔,公开表示忏悔,与第二时期尊佛抑孔刚好相反,成了鲜明对照。而这也就是章自己所谓其学术思想“终乃回真向俗”的最后阶段:即回到孔丘的传统怀抱,从“由俗成真”的佛学又到“回真向俗”的孔丘^①,“孔子之道所以与佛法不尽同者,正以其出世则能正趣真如,而入世又能经纬人事,是则所谓事理无碍者也。”(《答××书》)这正是与传统世俗调和一致,其过渡环节便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庄周哲学:“和以天倪则妄自破而纷亦解。所谓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荊汉微言》)章太炎晚年终于“粹然成为儒宗”,当了孔门经典的守护神。

总起来看,可以说,儒家古文经学(“六经皆史”^②,“夷夏之防”等等)和佛学唯识宗是章太炎思想来源的主干。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来源是在近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在章太炎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来起作用的,它们与现实斗争直接相关,不能离开这个根本要点来看思想渊源。实际上,如前所述,恰恰是因为这个要点使新内容旧形式、新时代旧传统、新旧语言产生交错渗透,才构成和呈现出一幅极为复杂的面貌。所以,上面所说的这些复杂性,还只是就章太炎思想的时期、过程、来源、成分而言,还是外在方面

① 这种由儒到佛又由佛返儒的思想行程,近代并非仅见。熊十力也如此,“余平生之学,颇涉诸玄而卒本大易”(《新唯识论》),“余……颇涉诸宗,尤于儒佛,用心深细……卒归本儒家大易”(《原儒》),也是由唯识回到周易。这一共同现象是颇堪注意的。熊当年也是同盟会员。以后梁漱溟又如此,尽管梁坚持自己为佛家。

② 章对荀卿、刘歆、章学诚评价之高,史所罕见,如说,“荀卿高过孔子”(《尴书·订孔》,“孔子死,名实足以仇者,汉之刘歆”(同上),等等。

的,实质内容的复杂性要在下节才能谈到。

(二) 社会政治思想的特色

(一) 是“地主阶级反满派代表”吗?

既然章太炎主要是作为思想家,在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中(即章的第二时期),在历史上起了重要客观作用和影响,那末就应该主要抓住这一段来进行分析。章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也的确是成熟在这一阶段的众多论著中。然而,也正是关于这一时期的章的思想属性,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便有过较多的分歧和争论。强调章和他的思想代表所谓“地主阶级反满派”一说,在讨论中最占上风,几成定论。章太炎被说成主要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的主要思想是汉族地主阶级的狭隘的反满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①。

此说所以颇占优势,当然有其原因。原因之一,便是章太炎的确有强烈的反满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并且由于他那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这种文化正是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这种思想就以极为耀眼的形式展示出来。打开章的文章论著,从文字到内容,从用词造句到博引古典,扑面而来的的确是一股封建主义的浓厚气息。春秋时代的“严夷夏之防”,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诸大师,几千年汉民族抵抗、反对异民族的各种历史、事迹和思想,为章太炎非常自觉地、反复不断地征引、强调。“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为之灌溉”(《答

^① 此说论著文章颇多。其中似以蔡尚思《论章炳麟思想的阶级性》(《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孙守任《论章炳麟政治思想的阶级属性及其发展的几个阶段》(《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两文论证最为充分详尽,可参阅。

铁铮》)。“用国粹来激动种姓”,唱出反满的最强音,把打击的矛头集中在满清政府^①及其帮闲走狗改良派身上,这确是当时章太炎在革命宣传战线上所进行的战斗。再加上章本人的确具有不少封建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情感,流露和表现在这些文章中,因之今天他被看作“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人物,也就不奇怪了。

但仔细分析一下,事情又并不如此简单。首先,所谓当时革命阵营中的“地主阶级反满派”这一概念的含义、内容、性质、阶级利益、具体情况……,并不很清楚,也似乎没人对此作过认真的论述。表现在思想史哲学史领域就更是如此。正如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历史无不客观上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一样,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更无不是在“向西方学习”这样一个前提和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章太炎本人便曾经是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民权思想的热情的学习者和宣传者。在《诂书》木刻本、铅印本中特别是在《驳康书》、邹容《革命军》序言中,都提出和表示赞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军》便是这种主义的典型作品)。例如说“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必为民主”(《驳康书》)^②等等。不仅章太炎,就是后来专门通过宣讲“国粹”来参加反满斗争,并奉章太炎为领袖的《国粹学报》(一九〇五年创刊)的那一批人,也仍然表白自己是在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下来保卫和发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例如声称这种文化不是供皇帝御用的君学,而是各朝“一

① “满洲弗逐,欲土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而已矣”(《诂书前录·客帝匡谬》),“夫排满即排强权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民族主义非专对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复仇是非论》,等等,说明并非全部都是狭隘的种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

② 一些论著(如赵金钰《章炳麟的政治思想》,《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根据这些材料便认为章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也是片面的。

二在野君子闭门读书忧时讲学的产物”，所以与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并无矛盾；相反，《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中关于“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祀以求者也”（《国粹学报》第七期）之类的提法、论点倒被他们经常强调。所以，虽然在当时实际政治生活中，确有相当多只知“扑满兴汉”别无所求的人投身革命，“有更多的人是因为简单地反对清朝政府而主张革命的，这种人各阶级都有，非常普遍”（吴玉章《辛亥革命》）。但要他们在革命派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力量，特别是在理论上思想上也如此，这恐怕不大可能，事实上也并不存在^①。把章太炎及其思想说成地主阶级反满派的代表，看来只是一种表面的描绘。如果章太炎主要思想只是单纯的反满，那也不会在当时有那么大的影响了。因为反满是当时整个革命派各派系和人员，所共同崇奉的最低纲领。反满的思想、主张、言论，在当时是广泛流行的。各种文章论著更是大谈特谈，非常突出。从谭嗣同、梁启超戊戌前在湖南办南学会、时务学堂起，宣传反满便日益成为一种革命思潮。章太炎在这方面不同于革命派许多人的特色，只是运用历史，引经据典而已。这与其说是阶级的原因，还不如说更多是由个人的因素（高度的传统文化教养）。并且，与当时革命派理论思想上完全一致，章的反满不但没有始终

① 有人认为光复会就是这样的派别，代表“地主阶级反满派”（罗耀九《光复会性质探讨》、《再探讨》，见《厦大学报》1960年第1期、1961年第1期），但把包括蔡元培、陶成章、鲁迅等人在内，有《龙华会章程》之类的纲领文献的组织，说成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派系，很难令人信服。（《龙华会章程》中即有“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这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陶成章还说：“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论，平民依旧吃苦，将来天下各国，定归还要革命……”这些都不是反满所能解释的。）

框限在简单的种族主义上,而且还是与反帝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①,在内容上并没有突出的原则区分。这一点是章太炎自己也承认的,他认为,民族主义上与孙中山等人没有分歧,分歧是在“民权”、“民生”两个方面(详后)。可见,从历史、文化角度反满,是章的特色之一,但远非全部。他至少还有另一特色在。这特色便是反资本主义的坚决态度。一方面要求并积极参与客观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事业;另一方面主观上又全面地、强烈地反对、抨击欧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理论……,这才是构成章太炎的全部复杂性的实质、内容和特色之所在。这一特色比反满重要,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映了近代中国的一些深刻问题,也构成了章太炎思想的丰盛面貌,给当时人们以强烈的印象和影响。

(二) 反资本主义的思想

章太炎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他并不同于地主阶级顽固派、洋务派和当时一般封建士大夫,盲目地、愚昧地排斥外来一切,或只接受船坚炮利、“奇技淫巧”。章太炎热心学习过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思想和政治主张。《馥书》木刻本中的《天论》(自然科学宇宙观),《原变》(达尔文进化论),《喻侈靡》^②,《馥书》铅印本、《驳康书》中的民主思想,都说明章开始时与当时“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并无二致,都在以不同方式(一般人是直接鼓吹,章是援引古典来倡导)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思

① 材料很多,“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排满平议》),并不是去灭种。“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革命军约法答问》)等等,等等。

② 接受并赞成资产阶级的消费观,认为“无所谓侈靡也”,与谭嗣同反俭主奢,用资本主义观点反对封建主义传统观念,完全一样。

想、文化……。属于改良主义时期的《馥书》木刻本不能说是代表“反满派”，主张“在今世则合众共和万不可已”的《驳康书》和显然为章太炎所赞同的邹容《革命军》不能说是代表“地主阶级”，它们明显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可以证明，章太炎并非一开始就拒绝，而是曾经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洗礼。那么，在章太炎思想发展的成熟阶段，当他在革命派中影响最大、为大家所推重的时期，怎么可能反而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倒成了“地主阶级反满派”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章太炎在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后，很快就走上自己的独特道路，即反资本主义的道路。当许多人日益热衷于欧风美雨之时，章太炎却高唱反调，反对“委心向西”，强调提倡国粹。他正是在愈益深入地了解和熟悉资本主义之后，才愈强烈地反对它。表面看来，他之排斥资本主义，似乎比当时提倡资本主义的改良派还要保守、落后。但用地主阶级阶级性来分析解释他的这些反资本主义的观点、论证，却又很难说通。他与封建地主阶级之反资本主义，情况并不相同。与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所谓欧游归来退到传统中去也不一样。

首先从政治思想讲起。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是革命派浴血以求的民权主义的具体目标，章太炎却坚决反对它。这种反对固然在当时确有抵制满清政府搞立宪的现实政治意义，“余向者提倡革命而不满于代议……是时所痛心疾首者，盖在君主立宪。”（《新纪元星期报发刊词》）但同样重要的是，在理论上，他也是的确反对这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不但反对满清政府搞立宪，而且也反对将来革命政府搞立宪，“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代议然否论》）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代议政治和民权思想，章甚至连当时为多数先进中国人所欣赏的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也在非议之列，为此而写《非

黄》。看来，这似乎连改良派也比不上，而与地主阶级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差不多属于同一个阶级了。地主阶级的顽固派、洋务派不正是坚决地、激烈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权、民主思想和议院制度的么？他们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和“中体西用”，顽固保卫封建地主阶级的君君臣臣的政治统治体系。所以他们反对议会民主的理由便是：“必核乎君为臣纲之实，则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行，议院万不可变通”（王仁俊：《实学平议》），“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此可谓有百害者也”（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而隶卒优倡俨然临于簪缨巾卷之上”（曾廉《飀庵集·上杜先生书》），如此等等。这是典型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害怕下层人民（所谓“愚民”、“乱民”、“隶卒优倡”）通过议会民主危及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所谓“纪纲不行”、“临于簪缨巾卷之上”）。章太炎也反对代议民主，那是否也就是站在这种立场上的呢？且看看他的反对理由：

代议政府非能伸民权而迨堙郁之。……欧美日本行之，民愈困穷（《与马良书》）。

被选者必在显贵仕宦之流，是无异一县有土客二令……此庸有异于专制者哉，……徒令豪民得逞，苞苴横流。（《记政闻社大会破坏状》）。

专制之国无议院，无议院则富人贫人相等夷，及设议院，而选充议士者，大抵出于豪家，名曰代表人民，其实依附政府，与官吏相朋比，是故共和政体而不分散财权，防制议士，则不如专制政体之为善也。（《五无论》）

是故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膏粱，名为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附其羽翼，使得媵媵齐民。……凡法之

自下定者，偏于拥护富民。今使议院尸其法律，求垄断者惟恐不周，况肯以土田平均相配？（《代议然否论》，下同）

章太炎对欧美日本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的选举法以纳税、财产、文化（识字与否）等等作为选举人或被选举人的标准，一一加以驳难，“以纳税定选权者，其巨戾亦已甚矣”，“所选必在豪右”。认为这些议士不过是一批骑在人民头上的新的压迫者，“美国之法，代议士在乡里，有私罪不得举告，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不欲有一政皇，况欲有数十百议皇耶”，“故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也。”因之，这种制度还不如没有的好，与其多这样一个压迫阶层还不如就在专制制度之下。“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可见，章太炎反对代议民主，与前述地主阶级的反对理由不但明显不同，而且恰恰相反。一个是怕代议民主会使人民站起来，一个是怕代议民主会又新添一批压迫者。所以不能把凡反代议民主都算作地主阶级思想。例如，1906年萍浏大起义中便打出过“新中华大帝国”的旗号，要求“勿徇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

章太炎是否在根本上反对民权呢？并不是。他是强调民权、平等的。他之提倡佛学，原因之一正在“佛教最恨君权……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演说录》下同）“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馥书》两次版本中多次还提到“议院”（如《地治》、《官统下》）^①。他也主张行政（总统）、司法、立法、教育分权，“夫欲恢廓民权而限制元首，亦多术矣”（《代议然否论》，下同），“置大总统则公，置代议士则戾”，“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他主张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无得解散禁止”，总统有罪，人人可诉诸

① 《检论》始全部删去。

法吏逮治。这样一些思想,都不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之,“凡自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反对由资产阶级定,那倒底如何定呢?章太炎向往着一种没有中间人(议员)的直接民权制。但这在实际中根本不可能。于是设想由一些超阶级的所谓“通达历史用知民间利病之士”即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们来监督元首、制定法律、决定和战大事等等。这当然是十足的空想,而且有利于保持封建主义。与“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章太炎不认识包裹在各种温情脉脉纱幕中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的阶级对立和斗争,而是把等级当阶级,强调“中国无阶级”,^①但是,章对地主统治的政权机构及其具体代表——各级官吏却又是深恶痛绝,主张打倒的。在辛亥革命后他还一再说:过去改朝换代“……其旧朝贪人恶吏未有不诛也,今倡义不过四月,天步遂夷,而致届不及墨吏”(《检论·大过》),“是故处今之世,不诛锄旧吏,去其太半,其他不悚然……不戮其人,纵令立法缅甸于日本,终不可以为善国矣”(《检论·对二宋》)。地主阶级及其思想家一般无例外地敌视农民起义,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包括像王夫之那样的大思想家也是如此。近代以来,从魏源到改良派,尽管有某些进步思想或民主思想,但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却从不含糊。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如汪士铎可以斥责孔孟,也同样在反农民起义问题上异常坚决。像曾国藩、张之洞更不用说了。然而,奇异的是,被看作“地主阶级代表”的章太炎在这个问题上却并不如此。他不论是论及历史上的和当代的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却很少诋毁反对。^② 难

① 章因反代议制(增加阶级)而强调“中国无阶级”,“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章所谓“阶级”指的都是中世纪封建等级,中国因系地主封建,不同于欧洲、印度,例如不像印度有界限森严的四阶级等等。

② 章对李自成等也使用“流寇”等词语,但整体来看,他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并不深恶痛绝而毋宁常有赞赏之意。

道这是偶然的么？

可见，章太炎之反资本主义代议制与顽固派、洋务派并不相同，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了捍卫地主阶级的政权体系、统治秩序和意识形态而去反对的。

可注意的是，章太炎的反代议民主恰好是与他的某些独特的经济思想联系在一起。章在反代议政治的同时，便提出：

……凡是皆可以抑官吏而伸齐民也。政府造币，惟得用金、银、铜，不得用纸，所以绝虚伪也。……不使钱轻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产也。轻盗贼之罪，不厚为富人报贫者也。（……譬如家有百万金者，取二十万金犹无害，家有十金者，取三金则病甚……）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躐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官设工场，率较其所成之值四分之一，以为饩禀，使役庸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凡是皆所以抑富强振贫弱也。夫是则君权可制矣，民困可息矣。（《代议然否论》）

这种思想并非仅见，例如章曾多次提出：

凡露田，不亲耕者使鬻之。（《馘书·定版籍》）^①

① 这是受孙中山的影响所写。但孙着重在城市土地问题，提出定地价税之类；章谈的是一般土地问题，主要在农村方面。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复会一派对孙中山的定地价税、土地国有之类的确不感兴趣。

一曰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曰官立工场,使用人得分赢利;三曰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曰解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斯四者行,则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无是四者,勿论君民立宪皆不如君主之为愈。(《五无论》)

目睹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面临国内资本主义的兴起,章太炎抱着强烈的怀疑、恐惧和敌对的情绪。他认为在欧美已是“以贫病箠斃死者,视以罢工横行死者,一岁之中,数常十倍”(《总同盟罢工序》),在中国则将“以意絜量,不过十年,中年以下不入工场被箠楚,乃转徙为乞丐,而富者愈与哲人相结,以陵同类,验之上海,其仪象可见也”(同上)。所以他主张不仅“均配土田”,而且还要着重打击工商资本。他的“均配”范围扩大到矿山、工厂、银行,^①显然这不是要促进而是故意要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以“重农抑商”的传统理论,一再强调要打击、困辱商人,反对“商日益横,工日益多,农日益减”(《五朝法律索引》),甚至荒唐到反对一切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地步,诸如认为“电车只为商人增利,于民事无益毫毛”(同上),“……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窟于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获,鼓腹而游矣。”(《四惑论》)看来这又似乎比地主阶级洋务派还要落后、反动了。因为洋务派还讲究“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于圣人之徒也”(《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能不能把章的这种思想当作“骗人”、“唐塞”或故作怪论、随便说说的呢?显然不能。事实上,这种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恰恰就

① 这种思想正是革命高潮中的产物,《馥书》木刻本中还有“西班牙人尝欲将富实之财以均贫者而卒至乱,人之有轻重且不能平,况于国乎”,铅印本删。

是章太炎自己的“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不同于孙中山以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为中心的民权、民生主义。所以章太炎说，“二党（指同盟会与光复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销弭党争书》）。章的这些思想显然代表了光复会中好些人（不是全部）的思想。如果看看《民报》增刊《天讨》中的《谕立宪党》的名文，这一点更极为明确突出。此文固然是针对满清政府搞立宪，但同时也批判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强调这只是“财主地棍土豪”的民主，实乃这些“绅董”的“专制”，它只能给“没钱没势”的农民大众带来痛苦（本书论改良派变法维新文中引有该文，可参阅）。

并且，这些独特的政治、经济思想还具有一个相当鲜明而一贯的理论系统。这个理论系统与当时风靡一时的进化论大有区别。章太炎这时抛弃了他也曾信奉的文明进步、物质幸福^①等等主张，走到宁肯要古代的俭朴生活也不要近代繁华世界，宁“啜菽饮浆”，“冬裘夏葛”，以求所谓心灵的快乐，而不要“沾沾物质之务”（《四惑论》）。他认为所谓进化并不带来幸福、快乐和道德，而是乐进苦亦进，善进恶也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俱分进化论》，下同），“由下级之哺乳动物以至人类，其善为进，其恶亦为进”，“虎豹虽食人，犹不自残其同类”，人“一战而伏尸百万，喋血千里”。因之“求幸福者，特贪冒之别名……最初所处之点惟是兽性，循其所处之点，日进不已，亦惟是扩张兽性，……则进化之恶，又甚于未进化也”（《四惑论》）。所谓进化、幸福只是动物性的东西，无道德之可言。“知文明之愈进者，斯蹂践人道亦逾甚”（《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有进于此，亦必

① 如删去的《诂书·喻侈靡》：“浸久而浸文明，则亦不得不浸久而浸侈靡……必举成周之世以警今人，则亦将举茹毛饮血以警成周……然则天下无所谓侈靡也，适其时之所尚而无匮其地力人力之所生则黠已”，“慧亦益启，侈亦益甚”，“是故侈靡者，有工之所自望也”云云。

有退于彼,何进化足言”(《四惑论》)。“以物质文明之故,人所尊崇不在爵位而在货殖,富商大贾之与贫民,不共席而坐共车而出……此非其进于恶耶”(《俱分进化论》)。

革命派和改良派大都以达尔文进化论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斗争理论。就这一点说,他们大都受严复的影响。章太炎则偏偏坚决反对严复,不仅在政治主张上,而且也在进化理论上。与严复强调斯宾塞,认为进化原理适用于社会故意对立,章太炎则引用赫胥黎等人来反对斯宾塞,认为进化只是自然规律,而非社会原理。“……举社会现象为证……进化论始成。同时即有赫胥黎氏与之反对”(《俱分进化论》),认为斯宾塞用生理、生物观点而不以心理、意识观点来解释社会,是错误的,“(斯宾塞)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美人葛通可斯(Giddings)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事,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译《社会学》序言)强调社会另有不同于自然进化的社会意识和人道规则。“黠者之必能诈愚,勇者之必能凌弱,此自然规律也,循自然规律则人道将穷,于是有人为规律以对治之,然后丞民有立。……今夫进化者,亦自然规律也……与人道初无与尔。”(《四惑论》)

既然进化论不是使社会健全民生幸福的规律,那么,究竟什么是这种规则而应为革命者所奉为目标和加以履行实现的呢?章太炎认为,这是心理、意识。不是生物进化而是社会心理和意识才是社会发生(“所始”)和进步的动力。具体一点说,章太炎认为,这就是道德。“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确是章太炎非常基本的思想。讲道德、重历史,始终贯串章整个思想之中。用所谓道德来衡量品评一切,是章非常突出的思想特征。他的倡导佛学,便是为了提倡佛入地狱的道德精神和众生平等的道德理想;他反孔批儒,是因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诸子学略

说》),完全着重在道德方面^①。章太炎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定,也多从道德着眼,例如章经常盛赞东汉,就是因为“季汉风节,上轶商周”,“东汉风尚二千年中为殊胜”的原故。他对当时“满清”政府、官吏和改良派的斗争,也总是尖锐揭露对方个人道德的堕落、人格的低劣。对“旧党”、“新党”各种腐败现象痛加抨击,“湛心利禄”、“廉耻丧尽”、官迷心窍、趋附势利、佞媚谄伪、怯懦畏葸……等等,经常是章太炎的得心应手的议论主题和打击武器。这种人身揭露的道德武器,在极端爱面子的中国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中,经常是使人狼狈不堪,能够取得很大战果的。

最有趣的是,章太炎从所谓道德标准出发,把当时社会分为十六个等级,他认为这些等级是与人们的“职业”——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客观地位、职能密切关联的:

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自艺士(医师画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

① 材料极多,不具引。如《演说录》:“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离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并且有时甚至连他所尊敬的荀子也骂在内。

而道德最坏、品级最低的则是为外国帝国主义所服务雇佣的人。

复为白人之外壁，非独依倚督抚而已。（均《革命之道德》）

这是一种相当独特的“行业分析”。它把下层人民自食其力不剥削压迫别人的“职业”跟“不知诈幻”、“刚毅不屈”的道德品级联系起来，把上流社会的道德堕落与他们的压迫剥削巧取豪夺的“职业”联系起来，它的矛头是指向上流社会，独特反映了对上层社会腐败恶劣的愤恨和憎恶。

章太炎强调革命者必须讲求道德。“且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同上），道德成为革命和一切进步作为的动力和目标。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不但在思想言论，而且在一定程度的身体力行上，都着重突出了甘于艰苦不畏牺牲的道德作风^①，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使章太炎这些独具一格的思想主张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鲁迅便是当年受章太炎影响的著名例子。除了进化论大不相同以外，在憎恶和抨击上流社会，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提倡宗教、道德、国粹和个性主义等等问题上，鲁迅基本上站在章太炎一边。如果拿鲁迅一九〇六年到一九〇八年写的那几篇著名论文，特别是《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与章太炎上述论点和论文比较一下，便很清楚。当年鲁迅在思想上和文字上都接受了章的影响。鲁迅一生之所以始终保持对章（在那么多的革命前辈中独对章）的高度尊敬，并力排众议，给章作了盖棺论定的极高评价，决不偶然。这决不只是个人的私谊，而是表露了鲁迅对自己青年时代所亲自感受的章太炎历史作用的十分珍视，是对章的历史功绩符合实际的肯定。

① 鲁迅深情怀念过陶成章把草绳当腰带，不畏艰辛奔走革命的动人情景。

(三) 阶级特征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章太炎上述的思想特色呢?它的社会阶级基础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把这些思想说成是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很难说通的。这些思想的某些成份、因素、提法,在中国古代地主文化中的确便有,但它们以如此完整的形态出现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却不是用古代翻版之类的说法所能解释得了。它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脱不开近代中国社会和阶级斗争的制约。不能无视它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中和在革命阵营内出现的思想或思潮。

列宁论托尔斯泰,对这个难题的解决也许很有启发。托尔斯泰是沙皇时代的名门贵族,他在自己的阔绰舒适的庄园里,安静地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不朽文学巨著。列宁在这位被当时好些革命者骂作贵族地主阶级代言人的伯爵老爷身上,在这些被当作纯粹是上流社会的风习画(主要人物、题材、故事、情节都是上层贵族等等)的艺术作品中,却极为尖锐地看到了感受到了,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巨大潮流中处在封建宗法落后关系中的俄罗斯农民群众的心声,指出那是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动荡年代中宗法农民思想和情绪、力量和缺陷的鲜明反映。“托尔斯泰出于真诚地以巨大的力量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白地暴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虚伪。但是他的教义却与现代制度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①，“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观念形态,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抗恶的主张,也就有深刻的悲观主

^① 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义调子,也就有认为‘一切都是无,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是无’的信念……”^①。

章太炎当然不是托尔斯泰。理论论文也不大同于艺术形象。特别是章太炎远没能像托尔斯泰那样终于与本阶级彻底决裂,自觉站到农民这边,而相反却是回到了封建地主的怀抱^②。章太炎比托尔斯泰高明的地方是主张暴力革命。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上层社会的憎恶和抨击,对资本主义(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全面反对,对封建农村的依恋和美化,提倡和特别强调道德、宗教作为根本基础,以及那深沉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情绪……,却确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说托尔斯泰是比较自觉而鲜明地代表了,那末章太炎便应是不自觉也不是那么鲜明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中作为小生产者的封建农民的某些特征和某些方面(不是全部或所有方面)^③。托、章当然还有民族的不同和各种具体情况的不同。章太炎以一个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继承捍卫者,在现实斗争中不自觉反映出农民阶级作为小生产者的民粹主义的思想情绪,具有更多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当

①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七卷。

② 例如在对待土地所有制这一关键问题上,章本曾主张“均配土田”,“有均田,无均富(指不分工商业主财产)……后王以是正社会主义者也。”(《馥书·通法》)“地权平均之后,全国无地主矣。”(《代议然否论》)但辛亥以后,政治上很快和封建势力合流,完全站在自己这一主张的对立面,反对“平均地权”了:“至若土地国有,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则大悖乎理,照田价而悉由国家收买,则又无此款,故绝对难行。”(《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会演说辞》)“社会主义在欧美尚难实行,奚论中国,其专地价税者,尤失称物平施之正,此土本无大地主。”(《复张季直书》)

这种变化并不奇怪,当年刘师培(也是光复会员)曾写《悲佃篇》,刊载于章主编之《民报》,大声疾呼“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夫今之田主,皆大盗也,……民受其阨与暴君同,今也夺其所有,以共之平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非常明确,十分激烈。然而曾几何时刘变而为叛徒特务,不齿于革命党人了。刘与章私交甚好,他们当时这些思想表现了同一思潮。

③ 最早指出章太炎这一阶级特征的是侯外庐《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但侯把他笼统说成是整个农民阶级的自觉代表,则显然估计过分了。

时革命派阵营中,本就弥漫着这样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民粹派思潮,孙中山、朱执信都有,而以章太炎和光复会某些人更典型,其中尤以章太炎为更浓厚、最突出。他的民粹派观点具有中国传统的封建特性。

农民是分阶层的,章太炎反映的主要是自耕农以上的阶层,并不代表贫雇农^①。章说,“中国土田农圃,自主者大半”(《代议然否论》),反映的并不是社会的现实,倒正好是他自己思想的现实。

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前,农民和资产阶级是近代革命中两个主要的积极力量。但它们的经济要求和政治理想并不相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资产阶级代议民主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和产物,它与农民阶级的愿望并不相通,后者更重视经济上的平等或平均,政治体制倒是次要的。反映在思想领域也如此。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强调发展近代工商业,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提倡科学和资本主义文化、教育,与强调解决土地问题、冲击现存统治秩序,而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并无多大兴趣甚至持敌对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总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连在一起),都可以同时涌现在革命高潮中。在中国近代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等高潮中都有过这种情况。这两种思想可以互相吵架以至彼此敌视,但在反帝国主义和推翻满清政府的共同战斗目标下,又仍可协调统一起来,章太炎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所以为革命派所允许,与朱执信等人所宣传的反“豪右”相呼应,起着一种独特的社会影响,原因也在于此。

事情也总是一分为二的。不能把农民阶级理想化,农民包括贫雇农在内,作为小生产者,总受封建生产方式的严重局限。他们坚

^① 对这一点,持农民说的论著(如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没提及,也未对章的思想作体系的剖析。

决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但他们同时又受地主阶级统治意识的严重毒害。他们并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包括像洪秀全这样的天才人物，即便有某种原始平等平均思想（主要是在经济平等上），但仍然保留很多的封建主义的东西，例如，在《天父诗》、《幼学诗》等等作品中便充满极浓厚的君尊臣卑、夫尊妇卑等等思想意识。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所以很快就露出封建帝王的雏型，正好说明这一点。农民革命思想中可以夹杂着一大堆封建主义的观点、意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反映了某种自耕农以上阶层的章太炎的思想就更如此。这并不是说，农民一定要反对新的生产力，而是说由于这种生产力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同到来，使农村破产，大量农民沦为雇佣工人，而感到恐惧不满和反抗。特别在近代，它又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联在一块的。早期无产阶级还捣毁机器，农民有反资思想并不奇怪。而一个阶级与其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关系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三二页），章太炎这些思想代表小资产者正是如此。如在论孙中山时所已指出，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有些思想家希望避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又要反封建统治，和想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封建古代，又不同于现代西方，既保留东方国粹又接受西方文明的“第三种社会”，便成为一种必然的时代思潮。这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俄罗斯（如民粹派）、在印度（如甘地）、在印尼（如苏加诺）……，都有这种倾向。然而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尽管用各种幻想和言词掩盖起来以自欺欺人，所谓东方精神文明（封建主义）终究要被西方物质文明（资本主义）所战胜。

一方面夹杂封建毒素，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小生产者惯有的反动空想，是章太炎思想的显著特征。在反满反帝的民族主义、经济平均主义、政治专制主义、道德纯洁主义之旁，再加上绝对个人主义和极端虚无主义，便构成了章的社会政治思想特色的全貌。章太炎抛

弃了《煊书》时期合群以进化的理论^①，大肆强调“个体为真，团体为幻”（《国家论》），“盖人者……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对于他人，均无责任”，“恶非人所当为，善亦非人之责任”（《四惑论》），“村落军旅牧群国家亦一切虚伪，惟人是真”，只有个人是真实的，任何社会组合均假。极力抨击、反对所谓社会抑制个人，要求绝对自由，个性解放，呼喊“何今世卒不得一摆轮（拜轮）也”（《论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章太炎并提出著名的所谓“无政府”、“无聚落”、“无人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境界，总之消灭宇宙一切。它的主观目的和客观作用不在于去维护或加固现有秩序和传统观念，而恰恰在于使人怀疑、否定它们。否认权威，怀疑一切；破坏流行的和习以为常的观念、道理，就正是章太炎“五无”“四惑”诸论在当时所起的积极的破坏效用。它不是地主阶级的思想，而是十分典型的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本质上完全是空想和废话。^② 有如章自己所说，就理想言，民族主义（反满）远不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又不如齐物（庄），不如无生（佛）。但就现实言，则“不得不退就民族主义”：“惟排满为其先务”^③。极端荒唐的“五无”幻想与极端狭窄的反满实践便这样奇妙地结合了起来。章太炎虽以反满为其主要现实目标，背后却有这么一大堆庞杂的思想作基础。

总起来看，章太炎这种独特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又有其落后以至反动的一面。例如想以道德作为革命动力，是唯心论，反对

① 强调群是竞争、进化的重要因素，“物苟存者，强有以与地竞矣，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煊书·原变》），批判“山林之士避世离俗以为亢者”，“将絜生民以为康蟪”，强调适应环境等等，完全是严复那一套，与《民报》时期的观点完全不同。

② 这种“五无”与康有为“九去”（《大同书》）不同，一是小生产者的悲观主义，一是资产者的乐观主义。前者否定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后者反之。

③ 当时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醉心于无政府主义，章太炎却清醒地加以反对。他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仍有一段距离。

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文化,则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向^①。反代议民主固然作为宣传在揭露资产阶级伪民主是尖锐的,同时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章太炎本来和严复完全不同,但在这个不赞成代议制民主问题上,在辛亥后却走到一起:因为怕因民主而使中国四分五裂,便宁愿“强有力的人”出来厉行专制,以使国家强盛,外御侵略,从而对袁世凯之流大抱幻想。^②对袁的上台当总统,章太炎主观上出了力;而袁的称帝,严复客观上帮了忙;一个是倾心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一个是具有乡土农村气质的民族文化的捍卫者,却居然如此殊途同归,这真是一场历史的悲剧。

三 “依自不依他”的哲学思想

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全部思想的世界观基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具有哲学上的思辨兴趣^③和独创性,企图综合古今中外铸冶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体系的,只有谭嗣同和章太炎两人(虽然就整个思想体系说他们不及康有为和孙中山)。谭、章二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是歧异和对立的。章声称不喜《仁学》,讥之为“拉杂失伦,如同梦寐”(《人无我论》)。谭嗣同的哲学体系尚未建成便死去,章则基本完成了。

① 与章太炎相反,孙中山认为“……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民报演讲辞》)。

② “余尝谓中国共和,造端与法美有异,始志专欲驱除满洲,又念时无雄略之士则未有能削平宇内者,……则争攘不已、祸流生民、国土破碎,必有二三十处,故逆定共和以调剂之,使有功者得更迭处位,非目政治为政治极轨也。”(《自编年谱 1912 年》)“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诚有其能,岂独吾辈所乐从,孙黄亦焉能立异也。”(章太炎《与袁世凯书》)

③ 两人都不喜佛学的禅宗,而选中思辨性最细致的唯识宗。此外,两人也都赞许庄周的齐物论。《仁学》一开头:“循环无端,道通为一,凡诵吾书皆可于斯二语领悟。”

然而可惊异的是,尽管有这许多政治、思想上的不同,但他们的哲学道路和特征却如此的相似:都从接受自然科学唯物论的洗礼开始,而以佛教唯识宗的主观唯心主义作归宿。他们的这一道路是有典型意义的。

在自然观方面,问题比较简单。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都是在接受从西方传来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这方面的观点和理论。谭嗣同《仁学》中对无限宇宙欢呼式的描绘,章太炎木刻本《馗书·天论》中对天、日、地的爽朗看法,都如此。章太炎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盛赞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反对传统的意志论、目的论。指出天并非上帝,不是主宰,“若夫天与帝则未尝有矣”。天就是“无”,就是气。“恒星皆日,日皆有地,地有蒙气,……望之若苍苍矣。在地曰气,仰瞻则曰天。”(《馗书·天论》)指出天地生万物并非为了人,天生人也并无何目的,“因气而生,偶自生也”,“人死而为枯骸,其血之转磷或为茅搜,其炭其盐,或流于草木,其铁在矿。”(《馗书·原教下》)意识(智虑)非气(物质),但从属于气。人死则智虑“若波之复”,如水波也息,所以无鬼神灵魂。“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水……”(《馗书·榦蛊》)这仍是以近代科学来填塞王充、范缜、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并同样带着机械论的近代特征。对佛学,章这时尚未给以特殊的地位^①。

与此同时,章这时是相信物竞天择的进化论的。“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太古之马,其蹄四指,……今海内有大陆,而马才一指。然则沧燥热燥之度变,物之与之竞者,其体亦变。”(《馗书·原

^① 章根据当时西方社会学家的材料,指出“上古野人”因“由日中视影”而以为“形体之外必有一灵异之身”,并征引佛典亦有此说,而发感叹说,“噫,以彼深识立鉴而犹不免于上古野人之说,何哉。”(《馗书·榦蛊》)

变》)这里最值得称道的是,章提出了“人之相竞也以器”的观点,指出“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也”,接受和宣传了以工具的改进作为人类进化尺度的观点^①。

章太炎进入他的思想成熟期后,却完全删去了木刻本《馗书》中的这些唯物主义思想,而且极为明确地宣布佛学唯识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才是他所崇奉的哲学。这个通路是从认识论来开辟的。

认识论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题。欧洲如此,中国亦然。在康有为那里,认识论还不占主要地位,但到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便逐渐成为他们哲学思想的中心。如果说《仁学》里,还是所谓“下学而上达”,唯物论与唯心论,科学与宗教,“以太”与“心力”还处在一种交互渗透、要求并存而又尖锐矛盾之中。前一方面(唯物论、科学、“以太”)还在客观上占有主要地位,但已开始建造以佛学唯识论为基础的唯心主义体系。那么在章太炎这里,这种建造就已竣工,从而科学、唯物主义被完全舍弃了。

与谭嗣同类似,章太炎开始也强调人通过感觉器去认识外界,承认人的主观感觉是客观物质所刺激而引起,指出有不依存于感觉的客观存在,“日色固有七,不岐光则不见也……不见其光,而不得谓之无色;见者异其光,而不得谓之无恒之色;虽缘睇子以为艺报,有不缘者矣”(《馗书·公言》),“人偶万物而视以己之发肤。发肤不触,夫谁不感觉”(《馗书·独圣上》)。“凡成比量(推理)者必不能纯无见量(感知)”(《齐物论释》);推理(比量)又必须建立在感知(见量)之的基础上。并且,“物之能名,大抵由于能受”(《国故论衡·原名》);“诸学莫不始于期验”(《征信录下》)……如此等等。章特

^① 在《太炎文录一·信史下》中却完全否定了这一点,认为物质文明并不进化,有时后不如前,“古不逮今,何言之唐大也”,并否认由石器而铜器而铁器的进化观点。

别注意西方的经验论^①,特别推崇中国的经验论(如颜元)^②,这与他的古文经学和朴学的重证据、材料本是一脉相通的。“从人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蓟汉微言》),从而,章的经验论的唯物主义比谭嗣同就远为坚实。谭嗣同刚说了两句“目视”“耳闻”之后,异常迅速地便推论感官“不足恃”,而走向唯心论。章太炎却在《馥书》中比较肯定地宣扬了经验论的认识论,唯物主义比较明确维持和残存(也只是残存)了较长较多时间。(如上引《齐物论释》等)^③

但正如章在道德问题上由幸福论走向反幸福论的康德一样,他在哲学上也是由休谟的怀疑论走到康德的先验论,再归宿于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佛学唯识宗^④。这时,木刻版《馥书》中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观点已完全消溶不见。章把休谟说成是“唯物论”,即彻底地相信感觉经验的意思。章指出从感觉经验出发,结

① 章太炎是反对唯理论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先物行先理动之为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不事先识则卜筮废,图谶断,建除堪与相之道黜矣。巫守既绝,智术穿凿亦因以废”(《国故论衡·原道上》),“最下有唯理论师以无体之名为实,独据偏计所执性,以为固然……,犹依空以置器,而空不实有。海羯尔(即黑格尔)以有无成为万物本,笛卡儿以数名为实体,此皆无体之名。……若谓心物外别有道,及太极、无理者即是妄说”(《国故论衡·辨性下》)。此外,如引叔本华及黑格尔加以反对,等等。

② “自荀卿以下,颜元可谓大儒矣。”(《馥书·颜学》)

③ 章太炎的许多说法(第三时期)是很接近谭嗣同的,例如“此生彼毁,成毁同时,是则毕竟无生,亦复无灭”,以及“真妄一源”,“泯绝彼此”,“破名相之封执,取酸咸于一味”,“一切矿物,皆在藏识,……由彼藏识与己藏识对构,方能映发,识之相遇,如无线电对至即通,不烦传递”(《蓟汉微言》),等等,只是比谭成熟深刻罢了。

④ 感觉不但有限度,而且感觉与对象之间也并不能完全对应,章太炎说,例如人种的眼睛颜色不一,所见颜色就不一定相同,因之感觉就没有真理性了,并且,“余谓吼谟(休谟)之说,犹未究也,感觉时,惟有光相热相,非有日相火相。日与火者,待意识取境分齐而为之名,故光与热为现象……,而日与火为非现象。若专信感觉者,日火尚不可得,况可言其舒光发热之功能成”(《四惑论》),更无客观因果可言了。“识得现起。意虽猛利,于境不现前时,亦得自起独头意识,然此独头意识亦非无端猝起,要必先有五俱意识与五识同取对境,……虽隔十年,独头意识犹得现前,是故五识与意识即以自造之境与自识更互缘生”(《建立宗教论》)。“五识”必待“五尘”为对境才生认识;境不在时也必须记忆,但此认识此记忆又仍不离心的主动,后者仍是决定性的。“如唯物论若穿其抵,即还归唯识论。何以言之,所以信唯物者,以不信意识之计度而信五识之感觉也。唯信者为谁,仍是意识。若充类至尽,此信心亦应除遣,……”(《蓟汉昌言》),如此等等。

果并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而只能获得孤立的表面的现象,要认识本质,必须有心中的“原型观念”来组织、联系、综合、伴随感觉。他说,“如人见三饭颗,若只缘印象者,感觉以后,当惟生‘饭颗、饭颗、饭颗’之想,必不得生‘三饭颗’之想。今有三饭颗之想者,……必有原由观念在其事前,必有综合作用在其事后。……虽然,此犹感觉以后事也。而当其初感觉时,亦有悟性为其助伴。”(《四惑论》)即是说,要认识三饭颗,必先有“三”这个“原型观念”来综合感觉。“言科学者,不能舍因果律。因果非物,乃原型观念之一端”(《四惑论》)。因果不在事物,而是一种“原型观念”,可见要进行认识,“感觉以悟性为依”关键仍在具有这些“原型观念”的“心”。这当然很明显是接受康德的“先验统觉”思想的原故。而从这里进一步就走入“境由心造”的佛学唯心主义之中去了。

感知、记忆、认识既都离不开“心”的主动作用,“境缘心生,心仗境起,若无境在,心亦不生”(《建立宗教论》)。从而,不是别的,是“心”、“识”才是第一性的,“芸芸万类,本一心耳”(《五无论》),“初知所感所定非外界,即是自心现影”。“道何所依据而有真伪,言何以所据而有是非,初无定轨,唯心所取”(《齐物论释》),真伪是非实全取决于“心”了。章自称“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在哲学上,即是以承认分析感觉经验始,由二元论而走到主观唯心主义终,这也是他为学的“转俗成真”,“俗”是经验现象,“真”是心灵本体。章太炎说:“夫五识者待有五尘为其对境,……境既谢落,取境之心不灭,……是故五识与意识者,即以自造之境与自识更互缘生。……解此数事,则此心为必有,宇宙为非有,所谓宇宙即是心之碍相”(《建立宗教论》)。于是在认识论上,也就根本否定了必须由感觉经验出发,转而追求神秘的寂定了。“不知而行,不见而名”(《齐物论释》),“是之非之,不由天降,非由他作,此皆生于此心”(《齐物论释》),“真见量,真比量,皆于寂定得之”(《蓟汉微

言》)。

章从而否定自然规律,时空的物质性^①,也否定任何上帝鬼神的客观存在。从这种哲学认识论出发,章太炎一方面反对唯物论,主张建立非人格神的宗教;另一方面又主张无神论^②,坚决驳斥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鬼神。因为,既然只有“心——识”是真实的,一切“我”、“物质”、“神”便都是虚幻的,所有这些“总是幻见幻想”。“此识是真,此我是幻,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一倒见也”,“此心是真,此质是幻,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二倒见也”,“此心是真,此神是幻,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三倒见也”(《建立宗教论》)。在这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上,建立一种非人格神的宗教,^③以否定任何外界的客观权威,“自贵其心不援鬼神”,从而勇往直前,去干革命,这就是章所规划所宣传所实行的他那“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的革命主张的具体内容和途径:

“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之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屈退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同上)。“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但不可取尼采贵族说),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

① “所谓自然规律者,非彼自然,由五识感触而觉其然,由意识取像而命为然,是始终不离知识,即不得言本在物中也”(《四惑论》),“时若实有,即非唯识”,“时由心造,其舒促亦由变”(《齐物论释》),“时间者起于心法生灭,相续无已……空间者,起于我慢”(《葑汉微言》)。

② 章的无神论的思想,先后期倒比较一贯,《馥书》木刻本称赞孔丘摈斥神怪,“无神之说发自公孟,排天之论起于刘柳,以知此汉族心理,不好依他,有此特长,故佛教迎机而入,而推者之功不得不归之孔子。世无孔子,则佛教亦不得盛行”,“其圣足以千百王之蛊”,到晚年《葑汉微言》也仍然反对信天、鬼。

③ 谭嗣同的宗教和主观唯心主义是在政治斗争中悲观绝望后的依靠,虽然其中也有积极成分;章则主要是积极方面,虽然其中也有消极成份。这是二人的不同处。

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奄矜之气,以此揭槩,庶于中国前途有益”(《答铁铮》)。总之,以道德作为革命基础和动力,反对追求幸福,反对物质文明,反对任何权威,反对一切束缚,不怕牺牲,不畏困苦,强调凭借个人主观的力量、精神、道德去进行战斗,这就是章太炎溶为一体的哲学世界观与其社会政治思想。这也就是所谓“依自不依他”的哲学体系^①。

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主观主义的狂热常常不脛而走。法国大革命高潮中,雅各宾的领袖们坚决驳斥法国唯物论,主张建立新宗教;德国在此热潮中出现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到了近代中国,更是如此,继承着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牺牲精神,当时革命派好些人的确做到了卓厉敢死、不畏牺牲、独立无前、道德高尚。与这种实践相结合,自谭嗣同提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仁学》),佛学唯识论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在近代中国突然流行一时,好些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欢迎和接受它^②,章太炎的哲学也就应运成熟在这个时期。

现实物质力量的薄弱常常使人们乞求于纯粹的心灵,由主观唯心论所煽起的热狂毕竟只能持续一个短暂的时刻,很快就消退。迷信主观精神和道德力量去拯救世界,终归要破产的。谭嗣同由

① 关于章的哲学思想需有专文分析,本文主要只谈其哲学思想与其社会政治思想有关的方面。

② “善习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勇而雄强刚猛者也”(《谭嗣同全集》第三八页),并也把佛学与平等、民权相联系,等等。佛学在晚清风靡一时,为许多先进分子和革命者所信奉,决非偶然。用佛学来解说西学和孔孟,用佛学来鼓舞斗志,是当时两大特色。梁启超当年曾说,“吾师友多治佛学,吾请言佛学”,他概括认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人世非厌世”,“乃无量非有限”,“乃平等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等等(《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可见当时佛学在他们心目中的意义。

于苦闷悲观而直接陷进了宗教泥坑,章太炎的这种哲学尽管可以鼓劲于一时,热狂于一阵,但毕竟受不住时间的考验,也终于与黑暗现实相调和妥协,他们都最终走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他们的哲学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由经验论到唯心论和主观地运用辩证法(章太炎《齐物论释》便很典型,本文暂略),这两点是谭、章二人这条道路的共同处,而这一点又是与他们(以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和近代自然科学只是处在一种外在(从外面去吸取甚至是附会一些科学知识)而非内在(受自然科学发展所推动)的联系有关。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从培根到洛克到法国唯物论,从笛卡儿二元论到康德二元论,从莱布尼兹的客观唯心论到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其中积极的因素都总是与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许多哲学家本身就是大科学家。中国近代却非常缺乏这种关系,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哲学中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内容都是极端幼稚甚至荒诞的,这与中国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直接相联,与当时近代工业极端微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非常弱小,包围着的是广大的落后小生产者的海洋的社会基础直接有关。因此,如何彻底改变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尽快实现现代化,倒也正是使唯物主义扎下根来,阻塞各种各样的主观唯心主义猖狂流行的一个重要(虽非全部或主要)方面。而这,不也正是近代中国哲学以及章太炎的哲学留给我们另一个很好的教训吗?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